

资本家的社会功能

西郭先生 May102001（原载世界经济论坛）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及张五常教授把酒砍山，闲聊中，听张五常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张五常先生随母亲逃难至广西某地，乘船溯江而上，在船上他头一次看到了纤夫拉船的景象。一二十个纤夫深埋着腰，肩头扛着绳子奋力地向前拉，而在纤夫们的后面有一个拿着大鞭子的人，密切地观察着每一个纤夫拉船的动作，发现哪个纤夫有偷懒的嫌疑，就一鞭子抽过去。并且，据说这个挥鞭子的人竟然还是这些纤夫们花钱雇的。于是，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就来了：这些人为什么要雇一个人来用鞭子抽打自己呢？张五常教授后来把这个例子和问题介绍给了他在加州大学的同事们，由此引致了“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理论”的诞生。

什么是“团队生产理论”呢？“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产品，根据其生产者的性质，都可以被划分为这样两类：个人产品和团队产品。所谓“个人产品”，是指可以由一个单个的自然人来“独立生产”的产品。所谓“团队产品”，则是指不能由一个单个的自然人来独立生产，而只能由两个和两个以上自然人组成的行政性协作团队来生产的产品。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绝大多数的产品都已经成为了团队产品，而绝大多数的企业就是这种生产团队。

“团队生产”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虽然从理论上说，产品是由团队的各个成员的投入结合而成的，但它却不能够从任何角度被分解为每一投入要素的分贡献，从而每一成员对团队生产的投入或贡献不能通过观察其个人独立成果的形式得到准确的计量。例如，我们不能说菜牛身体的哪个部分是由牧场的哪个员工创造的，我们也不能从船的移动上看出每个纤夫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是多少。可是，如果每个团队成员对于团队生产的贡献不能得到准确的计量，并将其与团队给予他的报酬挂钩，那么出于人的机会主义本性，至少一部分团队成员就可以通过减少自己的投入（“偷懒”）而从中得利。因此，团队又必须对每个成员的投入进行计量。既然通过观察“个人投入的独立成果”的方式来计量每个成员的贡献是不可能的，那么团队就只能通过直接观察每个人的“投入过程”的办法来对他的贡献加以计量。例如，通过观察你拉船的姿势来判断你是不是真的用了力。为此，团队就必须推出一个成员来作为全体团队成员的代理人，给他以一定的权力，让他专门来观察每一个其他成员的投入过程，以判断后者是否不折不扣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并根据每个人履行责任的情况来决定企业应给予他的报酬的数量，以及决定团队是否还应当继续保持与他的合约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来对每一个团队成员的工作进行“监督”。这样，团队中就产生出了一个地位特殊的人，他有权决定团队每个成员的收入甚至饭碗。

可是，即使采取了这种办法，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这问题就是：谁来监督监督者？所有团队成员的投入动力都要来源于监督者的监督，因此，如果监督者本人偷懒，那么它对整个团队生产效率的消极影响之大，将是任何一个其他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都不能比拟的。再安排一个人来监督监督者吗？那么这个更高一级的监督者又由谁来监督呢？可见，用这种为监督者设置监督者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无论这种监督链条有多长，只要它的源头上没有电压，整个链条就不会有电流。

然而，聪明的人类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把监督者的收入排到团队收入分配顺序的最后面。也就是说，把监督者的收入设置为一种“剩余收入”。更具体些说就是，团队的收入必须首先用来支付所有其他成员的约定报酬，支付完毕后，剩余的部分便是监督者的收入。剩余部分多，监督者的收入就多；剩余部分少，监督者的收入就少。这样一来，无论是谁偷懒，首先受到损害的都是监督者的收入。那么监督者当然就不干啦，于是他就会自发地对每一个团队成员全力实施监督，以保证自己的收入不受损失。而这样一来，整个团队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每一个团队成员的收入也都会随之而提高。

此外，一个生产团队除了要有统一的监督外，还要有统一的决策和指挥（不能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决策者和指挥者的工作积极性也同样会极大地影响团队每一个成员的工作积极性。那么怎样才能使决策者和指挥者拥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呢？办法也是一样：把决策和指挥权交给拿剩余收入的人。这样一来，生产团队的所有影响全局的最高权力（决策权、指挥权、监督权）就都集中到了一个人的手里。这个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

那么，这个拿剩余收入并掌握团队最高权力的人，是不是由谁来担任都可以呢？非也！经济学研究的结论是：企业的最高权力只有交给在企业中投入“赌注”最多的人，权力的行使才可能是谨慎的和有效率的。那么，谁在企业中投入“赌注”最多呢？不用说，当然是企业的资本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让劳动者来掌握企业生产的决策权，他们则会倾向于把资本作为一种廉价赌注而用于一切即使是胜率很低的赌博，从而使生产缺乏效率。

例如，我们假设资本在企业中的固定预付投入为 **80K**，劳动在企业中的固定预付投入为零。企业的总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之间分配的比例为 **1:1**。再假设存在一项可供企业选择的生产活动，该项生产活动的变动投入为 **10K+10L**；如果该生产活动成功，企业的收益为 **100**；如果失败的话，企业的收益为零，并且企业的所有固定投入和变动投入将全部损失；再假设该生产活动成功的概率为 **50%**。这样，从整个企业的效率的角度看，该项生产活动的收益

是 $100 \times 50\% = 50$ ，而成本是 $10K + 10L + 80K \times 50\% = 60$ ，该项生产活动显然是无效率的。

从资本所有者的角度看，该项生产活动的收益是 $100 \times 50\% \div 2 = 25$ ，而成本是 $10K + 80K \times 50\% = 50$ ，该项生产活动也是无效率的。

但从劳动者的角度看，该项生产活动的收益为 $100 \times 50\% \div 2 = 25$ ，成本为 $10L$ ，该项生产活动则是有效率的。因此，企业的决策如果由劳动来作出，那么它就会选择这一无效率的生产活动。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由劳动者控制的企业（如欧文式的劳动合作企业）逐渐被市场所淘汰，而由资本所有者控制的企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式。

在假公有制条件下，由于国有企业财产的真正所有者“全民”实际上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财产代理人，所以，企业财产对于它的任何一个实际控制者来说，都是一种世界上再不能廉价的“廉价赌注”。国有企业资本的损失，百分之百地等于“全民”的损失，但它给控制者本人所带来的损失则等于“损失 \div 12 亿”，近乎为零。也就是说，如果葬送 12 亿元的国有资本能够给他本人带来 1.1 元的个人收入，那么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有效率的“赌博”。所以，这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腐败猖獗，成为吞噬全体人民血汗的无底洞，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总的结论：有团队生产，就必须有统一的决策、指挥和监督。而这个决策、指挥和监督者又必须由在生产中投入了大赌注的人来担任，生产才可能是有效率的。因此，资本家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得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源能够获得最有效的使用，使得社会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而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任何人都是有好处的。总之，有了资本家，我们可能会遭受他的“鞭打”；但是如果没有资本家，我们又将会过一种比遭受鞭打更痛苦的贫困生活。

当然，我们上面这个结论的立论前提是，人类社会在制度方面只有两种选择：资本主义或假社会主义。在这个选择集内，资本主义优越于假社会主义，资本家优越于贪官污吏，是无庸置疑的。但事实上，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俺所推崇的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假如人类社会能够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我们上面的结论就不一定成立了。但是，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原理还远没有被人民大众所普遍认识，还难以进入人民大众的选择集，所以，俺所能作的也只能是在他们现有的视线范围内，告诉他们什么对他们更有利一些。

2001 年 5 月 9 日